



马洪基金会理事专题报告会

问势 2024

编者按：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今天，为深入剖析 2024 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3 月 28 日下午，马洪基金会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上海凯世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龙源精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网易科技《why 星人》的共同支持下，在银湖 CDI 大厦举办“问势 2024”理事报告会。

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邵汉青，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李罗力，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南岭，深圳市委原副秘书长乐正，深圳市决咨委专职委员刘忠朴，深圳市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贾兴东，马洪基金会理事王学东，合口味集团董事长孙小荔，深圳市海王集团党委书记王骥，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董事长韦在胜，工行粤港澳大湾区中心主任郑立华，同创伟业董事长郑伟鹤，宁聚共生集团董事长刘丹宁，深圳市钟表协会会长朱舜华及上海凯世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尹超等重要嘉宾出席会议，综研院专家、高校教授、马洪基金会智库百人会成员、社会组织领头人及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嘉宾参加会议，线上直播观看人数达 4 万余人。

现将“问势 2024”理事报告会主要嘉宾发言内容进行整理汇编，以飨读者。本刊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马洪基金会立场。

□ 致辞嘉宾

深圳智库联盟理事长、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职常务副主任 高振怀——

赓续智库专业伦理 发挥资政启民功能， 服务深圳发展

非常高兴参加马洪基金会“问势2024”理事报告会并致辞。坦诚地讲，对于参加论坛峰会活动，我持谨慎态度，很少参加。以往的经历，有些论坛确有质量，而有些则质量较差，特别是个别专家思想僵化、价值扭曲，作为受众有失望之感。而马洪基金会“问势”报告会这些年办出了鲜明特色，办出了高水准、高质量，与众不同。

首先，我要表达双重敬意：一是对马洪基金会表达敬意。“问势”理事报告会连续做了10年，形成了品牌，弥足珍贵。把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能够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地做下去，而且越做越好，实为不易。二是向近十年来参与“问势”报告会活动的所有专家学者表达敬意，特别是樊纲院长、唐杰市长等学者每次主旨演讲呈现的真知灼见、贡献的智慧，既有学术底蕴又能洞察社会，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现实品格，建设性和社会影响都很好。

其次，我简单讲几点思考和愿望：

一是继续强化“问势”平台的资政启民功能。“问势”平台已经具备了资政启民的内涵，是资政启民的重要载体。资政是以思想和智力产品服务决策，在此不多赘述。我要强调的是启民，有些智库往往忽略了启民功能，其实启民同等重要，在特定意义上甚至更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勇于发思想之先声”。启民的核心要义就是开启民智、引领社会、引领未来，做社会思潮和时代风向的摆渡人，让更多的人有思想、有文化、有常识逻辑。

辑、有正常的价值观，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课题。哈耶克说“真正改变世界的唯有思想”。只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思想和观念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价值取向、话语强弱、人心向背和国家祸福。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的思想强烈影响西方世界五百年的发展。福泽谕吉等思想家引领的明治维新奠定了日本的强国基础。一百年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其思想和观念的力量至今不衰。1978年中国的思想大解放带来了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

现在，有些智库、专家不是启民，而是愚民、误民，以错误的认知误导决策、误导民众。我们的社会要建立真正的理性文化，需要有更多“问势”平台的诞生来开启民智，引领时代。

二是赓续“问势”平台的专业伦理。智库的专业伦理就是智库人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它既是社会责任，也是基本的专业素质，其内涵就是向社会、向公众表达诉说真知和真理，底线就是讲真话，坚持充分理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就是以敬畏之心，无功利地执着于真理本身而不附加任何条件。

“问势”平台已经构建起了值得尊重的专业伦理体系并成为价值追求，但是有些智库、有些专家没有建立起专业伦理，甚至其专业伦理是扭曲、变态的，是反智主义的。我们要从“问势”平台的发展得到启迪，把专业伦理建设作为智库的核心能力来建设。

三是希望“问势”平台持续关注深圳、聚焦深圳。深圳现在至少承载六大国家战略：先行示范区、大湾区、综改试点、法治城市示范、前海深度改革开放和大湾区人才高地等。我认为，这些国家战略归结到一条就是改革开放，就是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深圳的功能价值、天然使命不单是GDP，更根本、更重要的价值是创造模式，为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提供具像化的模式样本。改革开放是永葆国运、民族复兴的不二法宝、根本方略。剑桥学者马丁·雅克说“真正的21世纪是从中国的1978年开始的”，这一年，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

中全会，改革开放启航。改革开放的伟大壮举惊艳了整个世界，颠覆、刷新了世界对中国的旧有认知，使世界重新定义中国，1978年，我们中国迎来了20世纪最壮丽的一轮日出。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大的胆识气魄和智慧开启新一轮改革开放。

具体到深圳的改革开放，我简单说两个角度：一是改革的视角，要从一般性改革向引领性改革转变、从数量型改革向质量型改革转变、从权宜之计型改革向具有永久价值的战略性改革转变。比如民营经济发展，去年7月19日，中央印发31条，从上到下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民企的信心和预期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仍然有空间。我们不能仅靠政策发力，根本的是制度变革、机制变革，要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阳光普照，让所有市场主体真正实现公平竞争。“民进国优”，民营经济要大踏步地前进，国企要优，一般竞争性领域让给民企，国企聚焦战略性、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做优做强，不一味追求规模。二是开放的视角，把重心从政策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未来的国际竞争更深刻地体现在规则和制度的竞争，制度型开放对于中国保持永久性开放具有决定意义。比如围绕加入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圳要争取先行探索、做压力测试，为国家探索出路子来。

衷心希望“问势”平台、马洪基金会、综开院和更多的智库为深圳引领全国的改革开放做足文章，提供高端的智力产品。祝愿报告会圆满成功！

□主讲嘉宾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 樊纲——

克服短期波动，推进长期增长

一年一度“问势”也需要回答一年一度新的问题，我们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切入。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短期问题，困难重重，尚未出现明显的好转迹象。同时，一些问题正在不断积累，经济形势呈现下滑趋势。在疫情期间，尽管政府的补助措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成本尚未大幅上升，许多业务暂停，日常开支得以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压力。然而，随着去年经济活动的逐步恢复，市场需求却未能同步回升，需求疲弱成为制约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进入今年以来，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乃至部分大型企业和服务业，开始感受到压力，难以为继。近期，企业倒闭、破产和失业的问题愈发严重，尽管部分经济指标显示出恢复迹象，但整体上通货紧缩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房地产市场的压力依然存在，市场仍在下滑。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在继续恶化，许多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困境。

存在一种普遍的关切，即经济增速是否会进一步放缓，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力维持至少5%的增长率。根据某些机构的分析，去年的经济增速大约为5.2%，而实际可能仅在2%左右。一般的观点则认为增速大约是4%。将近两年的数据平均来看，今年要达到5%的增长目标确实面临较大挑战。这是基于当前经济状况的估计，相信各位对此有着各自的见解和预测。然而，一些事实和现状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

面对这一现实，我相信决策层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今年的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二是采取积极

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并没有过高，计划增发1万亿长期国债，与去年的做法相似，并不构成特别新颖的政策。不过，我将在后文中阐述其理论层面的新意。今年我个人特别关注的两个政策措施是：一是鼓励大规模的设备更新改造以及居民的以旧换新活动；二是在未来几年增发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这两个政策的重点不在于增发的规模，而在于它们所体现的超长期概念。

为何我特别重视第一个政策？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已经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我们应当多发一些债务，用以偿还旧债。然而，我们当时就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即用新债务来偿还旧债务，实际上等同于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如果没有新的支出和购买，所谓的财政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就无从谈起。关键在于要有人去购买商品，从而引发需求扩张的乘数效应。如果没有购买行为，只是用债务来偿还债务，那么这些资金只是在金融体系内部流转，并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

因此，今年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实际上是一种增加需求的策略。通过提供补贴，促进制造业进行数字化改造，这是实实在在的需求。制造业需要物联网技术，需要在每个物品上安装传感器，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支出。同时，过去的老旧设备已不再适应当前的自动化和数字化需求，因此需要进行改造和更新。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并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我们期望各方能够积极行动，尤其是国有企业，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正如高主任之前所阐述的，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此我想进一步探讨国有企业的另一项重要职能，这在日常讨论中往往被忽视。国有企业作为公共资本的代表，应当承担起提供公共物品、增进公共利益的职责。在当前阶段，我们最需要的公共物品便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国有企业应当增加投入，即使这可能导致收益率的暂时下降，也能够为宏观经济稳定做出贡献，这是履行其作为公共资本的责任。

从宏观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这种行为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亏损，但这种亏

损实际上是为了创造更大的宏观经济需求，从而产生公共效应和乘数效应。这种宏观效率的实现，对于整个经济体的影响远比单纯追求微观层面的利润更为重要。

凯恩斯在论证扩大需求政策时曾提出一个著名的例子：雇佣一批人去挖掘一个废弃的矿井，并在其中埋藏一些美元，然后第二天再雇佣另一批人将这些美元挖出来作为工资。从微观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似乎是毫无效率的浪费。然而，从宏观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创造就业和需求，因为工人们拿到工资后会去消费，从而刺激经济活动。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应当发挥其在宏观经济稳定中的作用，追求宏观效率，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对于民营企业而言，由于资金和订单的缺乏，更新改造设备可能存在一定困难，此时国有企业应当带头进行设备更新，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持有信心。有些人将中国经济与当年的日本经济进行比较，认为中国也会像日本那样经历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长期衰退。然而，我认为我们可以深入讨论这种比较的合理性。首先，中日两国的发展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日本在1991年时的城市化率已接近80%，而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才刚过60%。此外，日本当时的社会收入分配较为均等，而我国目前仍以低收入群体为主体。在动机、激励和社会结构等方面，两国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与日本在发展阶段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在短期内，中日两国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债务率。虽然日本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与我国当前水平相近，但目前日本的债务率已远高于我国。具体来说，日本的债务率已超过GDP的260%，而我国目前约为80%。这里提到的债务率，指的是杠杆率，它不同于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率。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总额达到155万亿，这并非总资产，而是净资产，即扣除债务后的权益。这包括国有企业、金融企业以及政

府掌握的社会资产。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国有资产已所剩无几，例如意大利的资产负债表甚至呈现负数，即只有国债而无国家资产。在关键时刻，我国可以动用国有资产来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我们独有的“资产政策”可以利用国有资产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如房地产问题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同时提供公共服务。

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设备的更新改造是一项长期利好的措施。这不仅关系到未来的盈利预期，也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我们应当重视国有资产在宏观效率上的功能。

正如马克思所述，经济周期大约每七至八年出现一次。在一战和二战前的西方社会，经济危机大约每七至十年发生一次。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一周期性现象与设备的更新改造有关。设备通常在七至八年后折旧，新技术的出现促使企业购买新设备，从而拉动一轮经济景气。然而，当这一轮景气过去，需求随之消失，经济便陷入危机。因此，设备的更新改造应当受到高度重视，希望政府能在这一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对于家庭而言，以旧换新也是一个重要的刺激点。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少量补贴，鼓励家庭购买新家电、汽车等，以旧换新。这样的措施也能产生乘数效应，带动需求。许多家庭的家电和装修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期，适当的财政支出和补贴可以激发家庭的更新改造意愿。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促进消费而非仅仅偿还债务。通过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并以公众可接受的方式，利用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来推动需求的改善，这是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不及时发现并解决房地产领域的特殊问题，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新的挑战，因此，这也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方向。

在讨论特别长期国债和超长期国债的问题时，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尽管今年计划发行的1万亿国债相对于去年GDP增长后的总量而言，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从0.8%降至0.7%左右，但其背后的意义远超过简单的数字比例。与发达

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动辄超过10%的赤字率相比，我国的财政政策显得更为审慎和可持续。

我之所以重视长期国债，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对于我国的财政健康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我一直倡导发展长期国债市场，这是因为它们能够更好地匹配财政项目的资金需求和回报周期。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城市投资债券（城投债），面临一个严重的时期错配问题。所谓时期错配，是指借款所投入的项目可能需要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才能产生回报，如地铁、高铁、桥梁和道路等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些项目所依赖的却是五到十五年期的金融贷款。这种贷款期限与项目回报期限的不匹配，导致了潜在的违约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的另一个问题是金融债务被用于财政支出。财政项目的特点在于，它们并不要求立即回本或产生现金流，而是期望通过改善社会经济环境，提高GDP和税收，从而实现长期的回报。然而，目前的地方债务结构并未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专项债务要求专项回报，这与财政项目的本质是不相符的。

过去，我们使用了大量的金融债务来支持财政项目，而这些金融债务通常要求五到十五年内回流和回报。但现在，财政债务的发行并未根据财政项目的特性进行合理安排。这是财政改革和《预算法》实施的结果，导致了专项债务的剩余和未使用。

财政债务应当根据财政项目的特点来设计，即通过社会的收益来偿还借款，而非依赖项目本身的回报。因此，我一直主张发行长期国债，这些国债应当由政府财政统一发行，并通过税收来偿还。这样的债务才能真正体现财政的意义，并且是长期的。

关于长期国债的具体期限，我们可以参考国际上的做法。例如，日本有一个建筑生命周期规则，认为建筑的生命周期为64年，因此债务的偿还周期也应与之相匹配。美国纽约港务局发行的债券期限为17至18年，以港口的回报来

偿还。荷兰为了防范海潮而修建的海堤，甚至发行了永续债，只付利息而不还本金，这种债务至今仍在持续支付，体现了其长期的保护作用。

永续债是否值得推广，也值得我们深思。长期和超长期的国债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我们的许多投资是为了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例如，英国地铁庆祝150周年时，其隧道仍然是150年前挖掘的，未来150年也将继续使用。如果使用短期金融债务来支持这样的长期基础设施项目，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使用长期债务，并根据收益情况逐步偿还，这样才能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

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可以看到，超长期国债的机制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这一机制的建立，对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长期项目融资具有重要意义，它是财政改革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政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一议题具有一定的长期性，但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无疑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关于今年经济的展望，我持谨慎态度。然而，对于政府在某些方面的积极作为，我抱有乐观的期待。我衷心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使得相关政策能够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我不愿过多赘述其他问题，但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难点在于房地产市场和城投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期望国家能够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从国民经济和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角度出发，加大力度解决这些问题。对于那些需要救助的项目，应及时给予支持；对于那些需要稳定基础的领域，应确保其稳定。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防止问题的进一步恶化，避免因忽视小问题而导致整体经济形势的下滑。

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由于部分措施的缺失，导致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停滞，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相反，美国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通过政府直接干预，收购房地美和房利美等机构，成功稳定了房地产市场，最终实现了经济的恢复。这些成功的案例表明，宏观稳定是经济

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够以长远和宏观的视角来审视当前市场上出现的问题，并进行统筹安排。这包括动用国有资源，以及地方政府除了城投公司之外的其他金融公司和资产公司。这些盈利性的资产公司，可以在更新换代和宏观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来盘活一些项目，这不仅是动用国有资产的一种方式，也是在局部市场上发挥国有资产的宏观稳定和公共服务功能的体现。通过这样的措施，我们可以期待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有效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接下来谈长期问题。

在探讨长期发展问题时，我们不得不关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即生产能力和创新发展的能力。长期增长的关键，在于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生产力进步的驱动因素，以及如何通过提升这些因素来改善生产质量。传统上，生产力的概念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技术能力、生产要素以及生产组织方式。在这三个要素中，技术进步和知识增长无疑是最为关键的。

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生产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例如，矿石在没有冶炼技术的情况下，仅仅是一堆无用的石头。但一旦应用了冶炼技术，矿石便转化为宝贵的资源，成为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样，我们目前讨论的月球上的特殊物质，尽管其能源价值巨大，但由于目前尚无将其有效带回地球并利用的技术，它还不能被视为我们的资源和生产要素。

在当前时代，数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算法和计算能力，数据本身并无实际价值，仅仅是一堆数字。只有通过技术手段，数据才能转化为有价值的资源。这也反映了生产要素定义的演变。传统上，劳动被视为生产要素之一，但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未经教育的劳动已难以满足生产需求。即便是农民工这样的基础工作岗位，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教育水平和理解能力，才能适应现代化的工作流程。

生产组织方式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技术的发展决定了组织结构的形式。例如，电子商务、网络红人和直播带货等现象，都是现代技术的产物。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这些商业模式是无法实现的。同样，滴滴等网约车平台的兴起，也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支撑。这些新的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对生产力的提升有着直接的影响。良好的生产关系和商业模式能够带来丰厚的收益，而不良的生产关系和商业模式则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益低下。

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促使我们深入思考生产力的各个方面，包括技术进步、生产要素的更新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着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社会发展。

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为核心的趋势。在过去几年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变革，而人工智能则是信息技术发展的进一步延伸和提升，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前沿领域，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然而，在讨论新质生产力时，存在一些关于生产力的误解和误区。首先，一个普遍的误区是，一提到发展新质生产力，人们往往只关注高新科技领域，而严重忽视了传统产业的重要性。事实上，传统产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它们需要通过升级改造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即便在数字化的今天，我们举办论坛仍然需要座椅、会议厅和麦克风等基础设施。如果没有传统产业的支持，即便是最前沿的高新技术也无法得到有效应用。

在对各种产业进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产业感到自己缺乏存在感。地方政府在制定计划时往往只关注高新科技、新能源汽车、储能、人工智能等领域，而传统产业似乎被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现象在媒体和政府中也有所体现，传统产业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是在推动GDP增长方面，制造业仍然是主力军。地方政府在要求制造业贡献GDP时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提供补贴和支持时也不应

忘记传统产业的重要性。

此外，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应仅仅依赖政府的投入。政府的角色应当是创造良好的投资和运营环境，而不仅仅是在高新科技产业上进行大量投入。当前，企业注册和登记的流程已经变得相对简单，但企业进入市场后能否实现盈利、能否在竞争中生存下来，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企业的发展和运营才是最终目的，而进入市场只是第一步。

关于新型举国体制的误解也值得关注。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意味着让全国各地的政府和城市一哄而上，争相发展国家紧缺的“卡脖子”项目。举国体制的提出，是基于资源稀缺的现实，需要通过政府的力量集中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率。然而，当前的情况是，各地都在争相发展这些项目，导致稀缺资源的进一步碎片化。一些院士全国奔波，参与各种项目，这并不利于形成真正的举国之力。同时，一些科技项目由于缺乏持续投入和人力资源，最终变成了烂尾楼。这反映出我们在集中使用各种资源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提示我们在科研投入上需要更加精准和高效。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社会各界普遍理解并接受了“大干快上”的理念，纷纷投身于高新科技领域。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即将到来，我们的研究院也将迎来众多项目。然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各地的情况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无论是芯片产业、新能源还是其他热门领域，都成为了各地争相发展的重点，而传统产业却鲜有人问津，这种现象呈现出一种一哄而上的态势。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地域差异极大，不同地区适合发展的产业各不相同。我们不能盲目地追求最先进、最高端的产业，而忽视了本地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中部地区最近在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强，以及各项政策的相对优化。内陆地区和中部地区，特别是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已经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不同地区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发挥各自的优势，沿海地区如

深圳等应当专注于发展高精尖产业，而内陆地区则应当探索如何有效承接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将就业机会留在国内，为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新产业的发展无疑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例如，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等领域，由于其对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等方面的潜在影响，确实需要得到适当的监管。然而，我们也应当警惕过度监管和过长的审批流程，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在新技术的发展上落后于他人。原本我们可能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审批流程的繁琐和缓慢，最终可能导致我们成为追随者。这种情况在生物制药和生物产业领域尤为突出，因为这些领域涉及到人体安全等敏感问题，监管尤为严格。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概念和思路上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其他国家能够快速批准新技术，而我们却迟迟无法取得进展？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和比较，找出差距所在，并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我们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上能够保持竞争力和创新力。这不仅是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方面的挑战，也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中蕴含的风险。技术革命和快速的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我们需要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当前，我们可能面临被再次甩开的风险。例如，随着 ChatGPT、ChatGPT3.0、ChatGPT4.0 等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相继问世，以及 Sora 等新兴技术的崛起，我们发现自己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可能并不稳固。曾经引起广泛关注的 OPEN AI 董事会分裂事件，以及 Q-star 项目的暂停，都反映出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和挑战。

在全球范围内，大模型的数量已经从最初的几个增加到了上百多个，而在这场竞争中的位置如何，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人指出，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差距正在扩大，从以前的落后一年到现在可能落后四年，尽管这个差距的精确性尚无定论，但我们无疑需要加快追赶的步伐，以避免面临重大的风险。

这一现象揭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保持发达状态，而其他国家则处于后发状态？为什么我们需要发挥后发优势，而不仅仅是依靠比较优势来解决追赶问题？比较优势通常是指我们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例如廉价劳动力，但这种优势往往是相对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而言。当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就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从而丧失比较优势。近年来，我们正在逐步失去这种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

与此同时，我们在高级要素方面仍显不足，尽管我们正在努力通过发展教育和技术创新来弥补这些不足。发达国家则拥有优质的要素比较优势，包括丰富的资本、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强大的创新能力。目前，美国人均GDP达到7万多美元，而我们的人均GDP仅为1万多美元，人民币的贬值使得这一差距更加明显。与历史上德国追赶英国和欧洲的情况相比，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因为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和产业结构差距更大。

在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虽然巨大，但也正是这种差距激发了我们发挥比较优势，实现颠覆性和革命性的技术进步。然而，当前的情况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可能再次被拉远差距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我们能够在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中保持竞争力，避免再次落后。

当前，讨论生产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必须加快提升要素结构。要素结构的提升是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而如何快速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发挥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指的是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够利用更短的时间和更低的成本，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和吸收发达国家创造的知识和技能，以更快的速度和更经济的方式实现发展，这是一种走捷径的策略。这不仅是我们所期望的，同时也是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打压的方向。

美国目前对我们的打压，目的在于切断我们发挥后发优势的途径。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技术脱钩、断供高科技产品、限制学术交流，甚至限制留学生学

习关键技术，这些都是为了防止我们获取知识转移。长期以来，后发优势这一理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发达国家为何能够持续保持领先地位时，提出了知识也是资本的观点，认为知识能够创造更多的知识，知识存量的年增长量远超其他国家，从而使其他国家难以追赶。

基于这一理论，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促进发达国家的知识存量向我们溢出，通过学习和吸收这些知识，我们可以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从而改善和提升我们自己的要素结构。过去，我们依赖的是初级要素，而现在，我们应当努力提升为更多的高级要素。除了自主发展教育和科研之外，我们还应当通过学习、消化、引进和吸收等方式，来加速这一进程。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更加开放，为什么要追求高质量的开放？即使面对封锁，我们也应该向其他国家开放，对其他企业、其他产业开放，通过对外开放学习更多的先进知识，以促进自身的发展。

然而，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风险是被封锁在高墙之内，同时又自我封闭，无法通过各种途径迎头赶上，从而再次被甩开。如何真正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能够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保持活力和竞争力，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新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这些挑战需要我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人工智能（AI）的发展可能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正如历史上核技术的出现一样，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确保AI的安全。AI安全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应当密切关注的问题。

其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犯罪活动日益猖獗。例如，ChatGPT4.0等先进信息技术已经在多个国家的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制造虚假新闻等。信息技术在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更大的外部挑战。

再次，人工智能可能替代大量的人类劳动，从而导致失业问题的增加。尽管新技术能否创造新一代的就业机会目前尚无定论，但我们对新技术的态度通常是开放的。历史上，自从机器出现以来，机器替代人力的现象就一直存在。例如，在过去的西方世界中，工人们曾砸毁机器以维护自己的就业。如今，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在美国好莱坞等地出现，剧本创作人员要求禁止AI编写剧本。然而，这样的抗议和过去的砸毁机器行为一样，并不能阻止技术的发展。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新技术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创造了更大的产值，并催生了其他类型的就业机会。然而，当前的情况并不明朗，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不应忽视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创造就业方面的潜力。我们应当保留并促进这些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我们目前尚不清楚AI能够替代人力到何种程度，以及是否能够产生新的就业岗位。

此外，所谓的数字鸿沟可能导致社会差距进一步扩大，使得能够使用ChatGPT等先进工具的人群与无法使用的人群之间出现收入差距。包括基因工程在内的其他新技术也可能带来新的挑战。

在监管问题上，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一方面，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得到适当的监管；另一方面，企业应当积极拥抱监管，与监管部门进行沟通。新技术的创造者应当参与监管标准的制定，这不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有助于技术的平稳发展，减少混乱，从而发挥出更大的潜力，创造更多的价值。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发展关键的新质生产力，以及如何培育我们的创新能力。这两者是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显得尤为关键。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讨论了保持开放性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体制改革的问题。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关注现有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产业，更重要的是如何构建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以确保新技术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这将是我们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为此，首先需要改革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这是一

切的基础。

目前，我们的教育体系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改革职业教育的同时，也需要思考如何发展基础教育，如何激发更多人从事基础研究的兴趣。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启蒙思想，这是一种关乎人生境界的问题。我们应当鼓励学习不仅仅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和伦理观。

我们教育体系的根本问题在于未能将人们的思想境界提升到这一层次。在经济学中，教育被视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增加知识，从而增加人力资本，以便将来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然而，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包含了三个变量：GDP、预期寿命和教育。这里的教育作用并非仅体现在人力资本的增加和GDP的贡献上，而是体现在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上。正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所说，教育应当是理性的启蒙，让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这是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

因此，我们的教育体系应当在这一层次上进一步发展，以培养出更多能够承受实验室研究枯燥生活的人，他们应当由追求和好奇心驱动，而非仅仅由金钱和物质利益驱动。只有当我们的教育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才时，我们才能真正地思考和实现创新。创新在一开始可能看起来是不切实际的，但最终它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保护知识产权对于激发市场激励机制具有重要作用。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需要得到合理的激励，同时，为了持续推动创新，科学家们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通过保护知识产权，科学家们可以从自己的发明中获得利益，甚至获得一定的垄断性收益，这对于鼓励创新活动至关重要。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反而促进了知识的快速迭代。这种观点认为，具有创造力的企业会不断向前推进，而抄袭者只能模仿他们过去的成果。当抄袭者追上时，企业又已经创造出了新的东西，从而

加速了技术的迭代更新。然而，我认为保护知识产权仍然是更为稳妥的做法。市场机制的基础在于确保发明者能够从其创造中获得应有的回报。历史上，英国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部分原因在于英国较早地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瓦特蒸汽机的出现，正是因为瓦特和他的合伙人知道他们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保护，未来能够从中获得收益。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蒸汽机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可能无法实现。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也在关注如何改革科技创新体系，如何使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和核心。政府最近的文件中也提出了这一点，强调要发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应当根据市场需求来制定研发项目，并与科研院所、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合作进行研究。在发达国家，许多企业都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他们的国家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中心，各种科研机构共同参与。

然而，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科研院所往往不愿意与企业合作，因为他们的评价体系侧重于发表论文，而与企业合作可能被视为副业，对职称和职业发展帮助不大。这导致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在企业中得不到有效应用。实际上，企业的发展需要科研院所提供的基础科研作为技术进步的支撑。企业通常擅长应用型研究和创新，而应用的基础理论和基础应用往往是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方法，使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与企业的应用研究能够有效结合，形成完整的科研体系和创新生态。这样，我们的创新活动才能持续不断地发生，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最后，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如何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在深圳，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80%以上的科技创新成果来自于民营企业，现在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90%。尽管如此，民营企业仍然感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我们最近进行的关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调研显示，在多个领域中，民营企业普遍面临所有制歧视的问题。即便对于那些规模大、知名度高的民营企业，尽管政

府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大量的企业仍然难以获得项目支持，政府资助的审查过程严格，招标过程困难，普遍存在一种观念，即认为将资金给予国有企业更为稳妥，而对民营企业则持谨慎态度。这种不公平的歧视现象，对于许多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

此外，还存在规模歧视的问题，许多优惠政策倾向于大型企业，而小型企业则难以享受到这些优惠。

民营企业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使用自有资本进行投资，创新本身具有高风险性，因此民营企业具有较强的动力和激励。同时，民营企业的灵活性较强，更能够适应市场变化，捕捉机遇，进行尝试和纠错。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和国有基金在风险投资方面往往更为谨慎，由于审计和纪检的压力，失败的成本较高，导致创新活动难以开展。即使进行了尝试，也可能因为程序繁琐而错失良机。民营企业则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能够迅速捕捉市场的瞬息万变。

民营企业还有另一个优势，即在于专精特新的领域，这些领域往往需要持续的发展和几代人的努力。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层的更迭，很难保持长期的持续发展，而民营企业则能够做到这一点，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在某些需要长期积累和精耕细作的产业领域，民营经济的优势明显优于国有企业。

我们在面对来自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原材料和元器件领域的挑战时，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些领域往往规模不大，大型国有企业不愿意涉足，而依赖于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科技创新是一项庞大、多元、综合性的事业，只有充分发挥各类企业、大小企业的作用，才能确保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持续涌现，而不是昙花一现。

在讨论如何有效利用举国体制的问题时，我们必须明确举国体制并非分散体制，而是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在模仿创新领域，举国体制具有易于成功的优势。例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并非模仿创新，而我们的原子弹项目则

是典型的模仿创新。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这项技术的存在，了解了大致的技术路线，通过集中全国的力量，持之以恒地投入一段时间，最终取得了成功。无论是德国还是苏联，他们在技术上的路线基本相似，都是通过集中力量实现了技术突破。这实际上反映出，当科技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对于“卡脖子”的技术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组织和集中攻关的方式，实现模仿创新的成功。

然而，在无人区的创新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地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与当年的原子弹项目不同，现代的技术创新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需要不断的改进和迭代。迭代的速度可能相对较慢，因为这种创新不是为单一的雇主或国家创新生产的武器，而是需要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接受反馈和改进。

当前，我们面临的技术创新，特别是无人区的技术，不是单一买家的事情，而是市场上成千上万的使用者和生产者通过竞争、反馈和迭代的过程来实现的。在这个领域，企业必须站在前沿，市场机制必须发挥作用。虽然政府在“卡脖子”领域可能发挥一定作用，但在新的创新领域，我们需要更多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只有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企业才能发挥其聪明才智，不断迭代更新，接受市场的反馈，改进技术，不断向前发展。

我们当前关注的是中国的长期发展。虽然短期内中国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但长期来看，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如何利用这些潜力，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和开放真正使这些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努力的方向。除了科研人员自身的努力，政府和社会如何改进机制体制，促进技术的不断进步，改变我们的增长要素结构和生产能力，是我们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我们需要持续发展四十多年才能真正实现趋同和追赶。如果不做好这些工作，我们赶上去的可能性就会更小。因此，我们需要从长远的角度出发，更多地关注体制机制的问题，而非仅仅关注短期的得失。

□ 点评嘉宾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 唐杰——

转型升级与后发优势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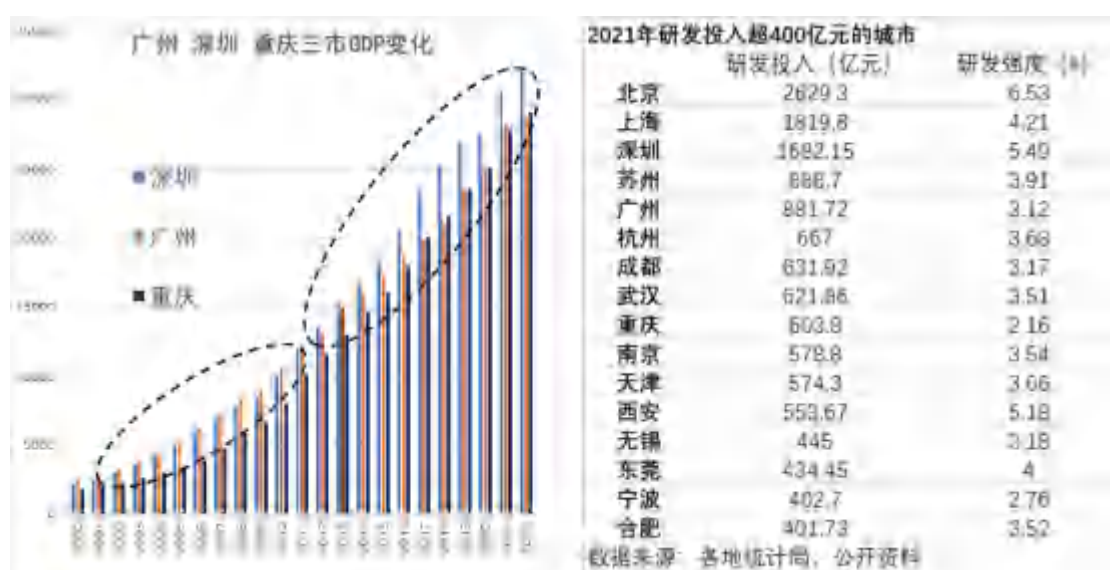
当我们研究当前形势的时候，都不可避免的陷入比较优势的框架当中，就此不断的讨论产业迁移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被抛弃。而樊纲的洞见说：初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只能依赖较短的时间，真正能够成为发达国家要建立后发优势。有人讨论，围绕传统三驾马车讨论经济增长没用了，投资不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当然，更核心的要素是知识。是以知识创造为核心的体系，要不断的提升知识创造、知识创新形成知识积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固定资产可以折旧，知识则是累加的，国家的知识不断成长，是可以持续推动发展的。

为什么落后区域需要更多依靠后发优势实现追赶呢？一是二战以来，成功追赶的案例很少，成功经济体的经验告诉我们，比较优势是实现追赶的起点，自主创新是知识创造，知识溢出是知识共享，将知识节点连接为知识链条是转型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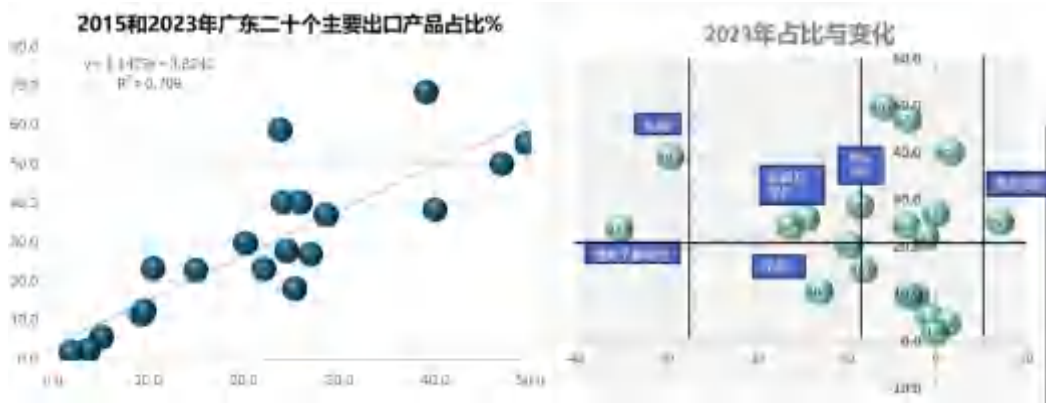
二是以中国国内 293 个地级市，34 个省级行政区为样本，与发达国家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省区转型是依靠投资转型，还是创新转型。如何建立长期依靠创新转型，依靠新质生产力转型的增长路径？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结束了依靠便宜要素增长的历史。按照全球价值链理论（GVC）来看垂直生产体系和水平生产体系，垂直生产体系是发达国家占据着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发展中国家承接价值链中的环节，发展中国家向上攀登过程中发达国家可以随时“踢开梯子，卡住脖子”；当变成水平生产体系的时候，一国生产前端产品的一部分，另一国生产前端产品的另一部分，还存在“卡脖子”吗？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进入创新增长一定是开放的。没有一个国家会生产全部产品，更不可能做到每个产品生产成本都是最优。另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南北差距越来越显著反映了什么？这与传统比较优势、很短期的初始价格差距的优势

丧失有关。比较优势不是与发达国家作比较，而是与同等的周边发展中国家作比较。即虽然我们比美国低6万美元，但深圳就是越南的10倍。比较优势失去之后，需要创造知识、保持创新的持续优势。后发优势不仅仅是吸引知识“溢入”，更需要内生的扩大知识存量和提升创新能力。阿罗的洞见说，“干中学”不是干一件事就学一件，它是持续的创新过程，是个体之间交互产生创新叠加指数般的增长，是会成为知识产生的过程。在空间上，创新在一个地点上集聚更有效率，就会产生知识的更加集聚。

三大城市“你追我赶”，证明了后发优势在发展阶段转换中具有重要作用。深圳追上广州、重庆追上广州、广州又超过重庆，内在的关系是什么？进入新世纪前十年，广州的结构转向重型化，成功发展了汽车、钢铁、仪器，迅速拉大与深圳的差距。深圳那个时候最热的词“深圳你被谁抛弃”。2012年之后深圳开始超越广州并持续拉大，内在超越广州的是什么？深圳和广州的研发投入差距持续在扩大，深圳走向了知识创造和知识创新的过程。广州实际上进入了新一轮的创新过程，可以看到广州和重庆的比较，尽管两座城市性质不同，但广州的R&D比重远高于重庆，短期内甩开广州并不容易。广州进入摆脱传统比较优势，进入后发优势的过程。



后发优势渐进地替代比较优势，替代过程既在产业之间也在产业内部。进一步研究一下转型的过程，根据海关总署出口统计，2023年25类商品出口中广东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的出口主导产业都是传统产业，最大的电脑及零部件比重不变。广东实际上是四家终端产业，美的、步步高、TCL、格力，冰箱、空调、洗衣机占全国出口的近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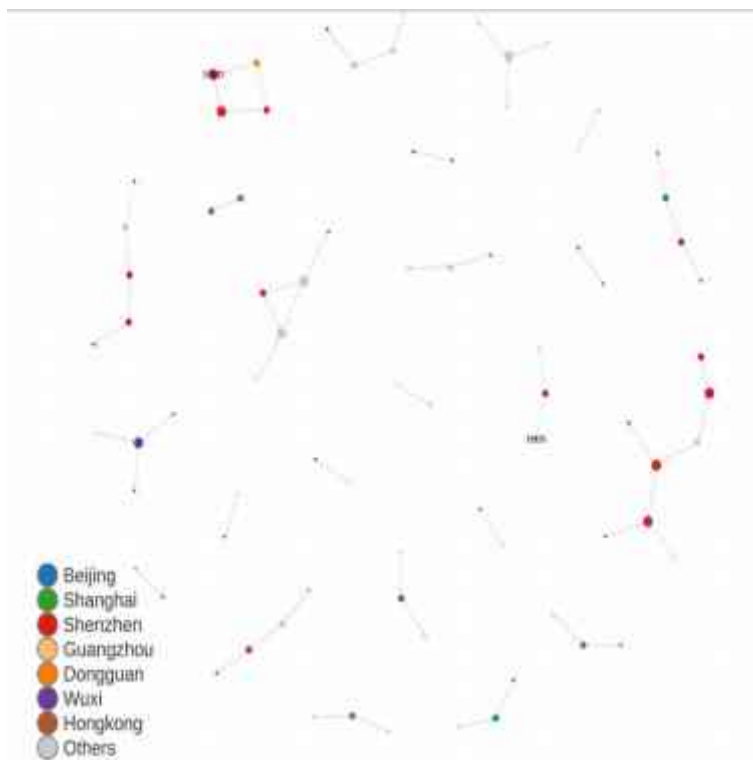


从左上图（横轴是广东 2015 年的 20 个产品的比重，纵轴是 2023 年的比重）高度相关意味着结构变化从比较优势向后发优势是渐变的过程，依赖于传统产业，走向新的结构。两年年结构相关性已经不是特别高，比例还是存在的。从右图来看，横轴以 0 为界，右边是产业占比增长，左边是产业占比下降；纵轴就是产业占全国的比重，占全国最高的比重将近一半。缩减最快的产业是锂离子蓄电池，显示了国内产业的竞争加剧；其次玩具、家具、手机装配下降，可以看到广东整体上，传统产业支撑着经济发展，但传统产业在全国占比中慢慢下降。真正有一个占比很高、占比增长很大的就是集成电路，李东生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为什么广东过去不搞集成电路？一是集成电路的运输成本近乎为零，体积很小、价值很高，运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二是芯片的需求要求稳定，所以大厂很重要。三是芯片投资巨大，8 寸 5 万片投资 105 亿美元，就是一艘福特号航母，它可以 45 年大修再用 25 年。而 8 寸线 8 年折旧完了。为什么广东现在开始做？全球芯片 70% 的终端使用在中国，中国的 70% 大概在珠三角。同时，珠三角家电快速增长以后，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车规级、家电级芯片的需求量大量调整。比如比亚迪和 BBA 相比，芯片的使用率是十倍的增长，200 到 2000

个基础块的增长。广东到目前为止集成电路变成了重要的创新产业，集成电路产业是高度知识、高度工业化、多相关知识的聚合过程。我们芯片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就卡在技术知识。整个广东的变化，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正在完成知识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替代有两个明显的案例，澄海玩具的后发优势。简单说玩具是传统产业吗？玩具是要被淘汰的产业吗？不是。玩具在中国很多省都可以做到，所以广东的玩具不再是一家独大，不再占六成以上，现在占三成。但是广东的塑料玩具中澄海县仍然占比50%。澄海玩具的变化是“上、中、下”全链条的变化，上有设计、研发、IP授权、原材料供应；下有贸易、展览、电商、仓储；中间就是模具，重点就是注塑加工、组装。澄海的塑料加工件的颗粒可以做到纳米级的精度，0.005mm。把塑料产品做到高精密的产品，把塑料产品做到智能化产品，把塑料玩具做成IP设计的产品，传统产业和AI的结合就变成一种知识创造的过程。政府在其中做了什么？汕头市澄海区发布《澄海区玩具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3—2030年）》，引导企业与科研单位的深度合作与集成创新，加强智能制造装备系统集成与创新。鼓励青少年们参与学习、策划编程，为行业提供智能积木配件与编程系统技术服务助力积木企业产品智能化。此外，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期间，澄海区玩具企业参展，有运用人工智能、编程技术的表演阵列机器人，也有航天飞船、航空母舰模型积木。传统产业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传统艺术结合。这意味着传统产业可以升级，通过知识含量，高难度、高精尖、高精密制造。还意味着原有的工人是做不了编程和设计，但是年轻一代可以做到。教育走向更多的智能化时，人才也就孕育而生了。因此，“没有传统的产业，只有传统的技术”。

第二个案例是深圳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这是典型的从无到有的产业，它的发展过程凝聚了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的过程。创新的特征是更多所谓的0到1来自于工程；创新大多数是渐进的，颠覆式的技术创新很少；突变是全新的赛道，渐进是把原赛道变得更流畅。政府的边界在于如何降低创新成本，如何提高创新收益。创新往往不可规划，是市场中类似于在混沌状态下试错产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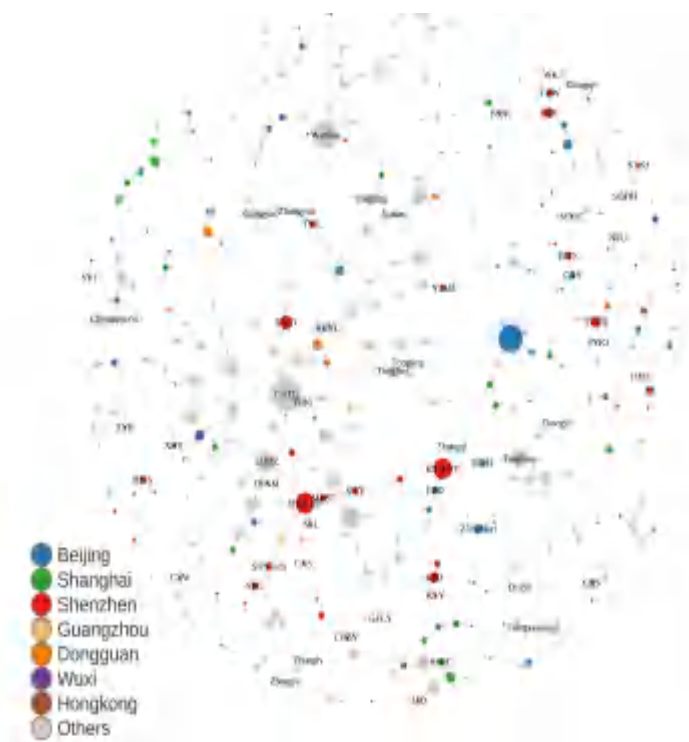
我们构建了一个数据库包括了 2009-2023 年，深圳市新能源汽车技术环节 3439 家企业，在招投标平台成交形成的供应链网络数据。没节点就没有技术，也就没有产业，产业一定有很多技术、很多企业生产零部件，比亚迪把它集成起来就变成了一台汽车。可以看到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下图），我们可以看到 2009 年到 2011 年深圳拥有新能源汽车企业不到 900 家，新能源汽车还是一个雏形，在产业链上能够参与的很有限，能连起来的点也较少。有一部分与 2001 年华为剥离的电气部门有关，如汇川技术、蓝海华腾、麦格米特、威迈斯、欣锐科技。



图：2009-2011 年深圳市新能源汽车企业及其四级供应链

深圳有 3439 个点在巨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比亚迪系，比亚迪锂电到比亚迪工业串起来一条线有若干企业围绕“小世界”，尽管比亚迪是一个垂直体系，到现在为止还可以生产 70%的零部件，但是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比亚迪一级供应商下的四级供应商，融汇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条。深圳还有另外一个链条是宁德时代，可以看到宁德时代-铜陵有色的链条上也有大量的深圳企业参与，它们的供应商在采购深圳产品。龙头如何成为龙头？

有人给你供货才能成为龙头。龙头企业发挥一个作用是把产业链串起来，在深圳构成了新能源汽车的电池链条，比亚迪串联了电池、电驱、电控的链条。第二个特点在于南科大、先进院、深大与产业的融合。创新是从科学走向产品的过程，大学和企业围绕产业链参与。深圳新能源汽车相关零部件企业，通过大学与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多元化、多层次的合作，将知识转换为产业的创新平台。第三个特点创新链条上节点的位置可以被定价。当我们挖到四级产业链的时候，供应商之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体系，深圳在新能源汽车的体系里，上市公司近30家，上市公司市值超过万亿，意味着知识创造过程是可以定价的。当知识可以被定价的时候，产业才是可以被发展的。



图：2021-2024年，深圳新能源汽车企业及其四级供应链

第四个特点深圳大量创新的中小企业被定义为专精特新，特别符合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中专业化、多样化是创新的源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分散化的知识就在这里。制造业二级代码下什么样的企业来做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生长在电子产业极其发达的城市，但是电子信息行业企业占四级供应链企业总数只有7.8%，它本身是汽车行业，也只有15%和汽车有关。大量做新能源的

企业是混合型产业，它既是汽车，也是信息，也是机械加工，也是材料。创新过程是一个多样化的故事，多种技术在一个时期的汇聚产生了一个创新的支持者相关外溢和相关融合产生了一个新技术。在这一分布中，其实大学很重要，但是比例并不高，大学更多承担了科学发现。正如任正非说若果有人拧熄了灯塔，高校的明灯照耀着产业，大学老师的纯研究，看得远、钻得深；我们的研究实用度强，我们之间合作，你们给我们带来方向，照亮了我们。

现在来看深圳政府做对了什么？一是创造了“科学雨林，无限生境”的市场竞争环境；二是支持了龙头企业的发展，支持比亚迪的发展不在于给比亚迪多少优惠，支持比亚迪发展有两件事，一个是比亚迪至暗时刻的5.26事件，是政府主导的权威测试，测试的结果56天，证明比亚迪e6是一台优秀的车。第二个是政府确定了一个需求规划，五年对公交大巴和出租车进行替换，提供了300亿的大市场。第三个政府还做了严格的标准标准体系。三是政府引导分项技术的深入研发，研发的资助最大限度的提高了企业创新的收益，最大程度缩小的创新风险，350个项目构成了深圳3439个点的核心骨干企业。挖了政府研发资助新能源汽车企业的350个项目（见下表），对应着整车、高级驾驶智能、动力电池、电机电控，其中深圳资助集中在动力系统，电池材料的资助非常多的，其中包括了德方纳米、贝特瑞等等著名的材料企业。为什么重点支持动力系统呢？新能源汽车的所有技术都产生在欧美日，电池密度达不到、材料无法控制一直是重要的问题。深圳企业做到了，宁德时代做到了，这里有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政府如何资助企业做研究应当值得重视。常识来看，中央的支持更加偏向基础，地方的支持更加偏向应用。结果中央和省更加偏向应用基础，地方更加偏向基础和应用研究及产业化。

当我们走向后发优势，是从“便宜”要素走向依靠知识集聚的过程。如何激励创造一个全社会创造知识、分享知识，知识外溢畅通的体系是极其重要的。地方政府或是整体政府扩大知识的创新和溢出是主要的。资助企业研发、选择研发项目，并不选择谁是优胜者。有研发的企业才可能是优胜者，但真正的优

胜者是比亚迪选的，是华为选的，不是政府选的。

表：深圳市政府创新研究资助

| 占比 | 整车及制造 | 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 娱乐系统 | | | | 车身系统 | 动力系统 | | | | | 插电式混动 | 燃料电池 | 充电桩 | |
|----------|-------|-----------|------|------|-------|------|------|--------|--------------|------|--------|-------|-------|-------|-----|-----|
| | | | 车联网 | | 智能终端 | 服务平台 | | 自动驾驶服务 | 纯电动汽车 | | | | | | | |
| | | | 车联网 | 车联网 | | | | | 动力电池制造设备及生产线 | 电池材料 | 动力电池产品 | 电机及电控 | | | | 小三电 |
| | 8 | 15 | 34 | 11 | 9 | 12 | 31 | 86 | 63 | 37 | 14 | 10 | 6 | 25 | | |
| 中央及省级 | 28% | 20% | 25% | 28% | 11% | 8% | 13% | 3% | 8% | 19% | 14% | 20% | | 12% | | |
| 市级 | 73% | 80% | 74% | 72% | 89% | 92% | 87% | 97% | 92% | 81% | 90% | 80% | 100% | 78% | | |
| 基础研究 | - | 25% | 18% | - | - | - | - | 38% | 19% | 30% | 8% | 30% | 30% | 4.5% | | |
| 应用基础研究 | 33% | 17% | 6% | - | 12.5% | 64% | 7% | 18% | 13% | 10% | 17% | - | 25% | 18% | | |
| 应用研究及产业化 | 66% | 58% | 76% | 100% | 88.5% | 36% | 93% | 12% | 67% | 60% | 75% | 50% | 25% | 77.5% | | |

总之，经济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征程，永远会面对来自内外部风险。我们要关注重视短期风险，但要紧紧抓住创新发展，要努力实现从浅层工业化向深度工业化的转型，在双循环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机遇。

《马洪基金会专刊》是深圳市马洪经济研究发展基金会编印的内部参阅资料。

- ◇ 读者群为基金会上级领导部门、理事和名誉理事、智库百人会专家学者及其他机构、企业的高层管理者。
- ◇ 主要内容为重大研讨活动、论坛、沙龙等学术交流中富有价值和启发性的综述文稿及学者文章。
- ◇ 稿件来源以马洪基金会及智库百人会的专家智者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4 楼 邮 编：518029

联系人：林洁漫 责任编辑：吴泽婷

电 话：0755-82470728 电 话：0755-82470650

网 址：http://www.szmhf.com 微信公众号：szmhf01

